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專號導言

吳鯤魯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018年5月馬來西亞國會大選達成60餘年來第一次民主選舉政權輪替。基於馬來西亞與我國民間往來密切，民主化深具潛力，特策劃「馬來西亞民主轉型專號」，剖析馬來西亞大選變天的前因後果與民主化轉型的前景及影響。

馬來西亞國內源遠流長的多元複雜族群人民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度，長期執政的國民陣線是自獨立開始就建立的跨族群政黨聯盟，由馬來人為主體的巫統所主導，一向以避免族群衝突、加強國家安全為由，限縮人民自由權利，也因此國陣執政時期一直被視為威權政體的一種變型。

幸賴馬國公民社會傳統不絕如縷，新世紀伊始，社會力結合新興媒體，撐起自由空間，引導政體轉型，終致首度政黨輪替。「希望聯盟」打敗長期執政卻分裂的國陣，贏得政權。然而多黨恩仇縱橫捭闔，老首相馬哈迪領導的新政府不過執政才22個月，就失去執政權，民主轉型再度面臨挑戰。

對馬國的政治發展前景，本期不同作者有基於相異觀點的討論，分別從族群政治、公民運動、留台女性知識份子參與，以及東馬砂拉越邦的角度提出研究見解。總括而言，面臨內部族群、宗教及黨派林立的現狀挑戰，各政治勢力對憲政體制及政經發展方向的詮釋充滿分歧，馬來西亞民主政治展望仍然不明，卻已是東協中最值得期待的國家。

關鍵詞：馬來西亞民主化、公民社會、選舉、政體轉型

2018年5月馬來西亞第14屆國會大選，一舉達成60餘年來第一次民主選舉政權輪替。基於馬來西亞與我國、特別是民間社會的關係密切，而在東南亞國協（下文簡稱東協）各國中，馬國民主化也最具潛力，本刊因此策劃「馬來西亞民主轉型專號」，結集研究論文，剖析馬來西亞大選變天的前因後果與民主化轉型的前景及影響。

放眼東協各國，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發展看似異軍突起，讓人一新耳目。其實不然，從全球第三波民主化以來，菲律賓、泰國、印尼以至於緬甸，都曾出現大選後政權輪替，幾度開啟民主化契機，然而當前各國的政體轉型卻都走了回頭路。若以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以及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對世界各國調查報告為準，2020年的東協內已經沒有被評定為「自由國家」或「完全民主國家」的成員了。無論如何，兩個調查都將馬來西亞列為東協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因面臨內部族群、宗教及黨派林立的現狀挑戰，國內各政治勢力對政經發展方向的詮釋充滿分歧，未來的穩定度低，展望仍然不明。

當代民主政治是一種以選舉、國會與政黨作為基礎的普遍性代議體制安排，這三樣元素至今仍是任何國家轉型成民主政體時必須加入的制度設計，缺一不可。公平的民主遊戲規則界定了參與者、勝負得失與包括如何改變規則在內的所有程序。其中選舉制度是將選票轉換成公職的重要制度，特別是國會選舉可將選民投票意向換算國會的席次，顯現此時此地全體國民對不同政治力量及主張的支持程度。選舉結果總是具有不確定性且定期舉行，則成為吸納所有政治力量持續投入參與，而得以建立穩定政局的關鍵機制。2018年5月9日馬國第14屆國會大選投票後，長期執政的聯盟落敗，

在野陣營獲勝，這個結果事前很少人預料到，最終仍能順利完成政權輪替，殊為不易。

民主國家的政黨則具備利益表達與匯集的功能，為實現政治理念，甄拔政治人才，推動其珍視的社會價值發展而參與選舉，推出候選人取得政治席位，進而勝取執政權；落敗為在野黨，無論是否享有國會席次，仍可持續監督與介入施政。在馬來西亞，聯邦的國會選舉以及競爭性政黨體制都長期存在，是不爭的事實。

但並非有反對黨存在或者定期舉辦選舉就是民主國家，選舉的威權或獨裁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or electoral autocracy）世所多見。民主與否的區別還要視人民政治參與的自由能否確保。只有在自由民主體制安排下，保障言論自由，維護或促進弱勢群體的權益，並且鼓勵公民社會的成長壯大，社會大眾於是可透過各種管道去認識政治事實、了解公共事務，評估施政得失，藉以監督政府。當政府表現不佳、令人失望時，人民也才能利用選舉的機會換掉政府，促成政權輪替。

實際上，無論政體性質如何，就算選舉結果不會影響政權存續，執政黨總還是會為求勝選，使盡手段。其中尤其常見利用社會類屬差異進行「分歧動員」，吸引較大的民意支持。在民主政體，求勝選，當然是因為政權取得全賴選票及換算成的國會議席，為兵家必爭之地；即使在威權政體，只要有選舉存在，政權的正當性還是會和選舉勝敗有關，選舉投票仍是重要的政治穩定機制。在當今的世界，就算心中向來輕蔑競爭型民主政治的主政者也很少公然表態否定民主，東協各國中，即使是軍事政變上臺如泰國、緬甸的軍政府都得對外表態未來會恢復選舉。而對於進化後的一些軟性威權執政者而言，選舉更可宣洩民怨、理解並回饋人民需求，並作為內部汰舊換新與判斷吸納異議人士與否的機制，有一定鞏固政權的功用。

馬來西亞自上個世紀 50 年代奮力掙脫英國殖民，從自治到成為獨立的、世俗的伊斯蘭國家，承接英國前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議會內閣制，並在形式上採取聯邦制，聯邦最高元首由世襲的 9 個州屬的馬來蘇丹選出，輪流擔任，民選的眾議院成員則享有實權（石忠山，2018：50-56）。從自治階段起，眾議員選舉就一直持續，除了在 1969 年的 513 事件後因緊急事態戒嚴而暫停一年半左右之外，國會的換屆改選與運作以及相關的政黨政治，幾乎不曾中斷，這和多數其他威權國家總是中斷選舉並禁止政黨活動的經驗並不相同（Mauzy，2006：55-58）。

馬國國內有源遠流長的多元族群人民，人口總數近 3200 萬，族群相當複雜，馬來裔、華裔、印度裔與其他東馬的原住民（主要有伊班人 Iban 與卡達山人 Kadazan）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度。長期執政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簡稱國陣，馬來文為 Barisan Nasional，簡稱 BN），獨立建國開始就建立世上少見的跨族群政黨聯盟，1974 年成立為陣線。國陣一向由馬來人為主體的政黨，即巫統所主導，此種少見的由各族群先各自成立政黨再跨族群結盟的組織形式，至少將族群不平等關係某種程度做了交叉區隔，甚至為政治學學者視為「協商式民主」（consociationalism）的模式（Lijphart，1980；Rodan，2004：112-4）。雖然由於自獨立起就有土著優先的憲政安排，馬來人種族政治常成為被批評的缺失。但從民主化理論而言，此種具妥協性及吸納性的政黨聯盟避免了特定群體權力過度集中，對政體轉型多少是有所助益的。當然長期以來，以巫統為核心的執政勢力一向拿著避免族群衝突、加強國家安全為令箭，依法設令，限縮人民自由權利，甚至逮捕鎮壓而削弱反對力量。也因此國陣執政時期一直被視為「不自由的民主政治（illiberal democracies）」、或「選舉性一黨制國家」其實仍然是威權政體的一

airiti

種變型。即使發生過政權輪替，馬來西亞在不盡公平的族群環境下，單一選區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約制下，加上通過選區重劃放大馬來人選票的技倆，許多民主政治的問題依然糾結於馬來西亞政治及文化結構，並不容易就此解決（黃進發，2018）。

威權政體轉型的民主化過程，固然依靠民間力量不斷抗爭，但常常因歷史的適然（contingent）因素啟動，常見的是外部條件改變，而威權集團裡菁英分裂，從而打開政體轉型的機會之窗。此時，公共異議媒體、社運團體及反對運動的抗爭及奪權策略抉擇得當與否，就格外重要。民主化理論並推論，啟動之後，民主遊戲規則的逐步確立牽涉到相當多條件。不論其他外在因素，目前從各項實質的內部民主化條件相比較，馬來西亞仍然是東協各國中最具成功民主化轉型潛力的國家。

回溯馬來西亞對族群與宗教問題極端敏感，立法嚴格約束人民限制公開討論，這個基本態度其來有自，早從獨立階段即扎下歷史根源。1969 年的 513 種族事件前後的一長串歷史教訓成為馬國政府樹立內部安全法、反煽動法、宗教法及對出版品管制法令的理由，嚴格禁止討論可能觸及族群敏感神經的內容。特別是在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從 1981 年起任首相的 22 年間，雖然歷經不少執政陣營內外的挑戰，但政府運用族群與宗教問題而宰制民間的威權日甚一日，直到他在 2003 年年末主動下臺，繼任者推行有限的開放政策，傳統上對公民社會與大眾傳媒的控制才略略出現鬆動的跡象。

馬哈迪除了政治上威權壓制異議之外，在政治經濟上則延用巫統 1970 年代以來平權扶弱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扶助本土馬來人為宗旨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y Policy），具體手段是重新分配馬來人和非馬來人的財富，其後並大幅採取主權財富基金模

式，由馬來西亞國庫（*Khazanah Nasional*）控股公司總攬全國投資事務。成效固然有，但政策的流弊造成國營企業快速壯大與政商合謀轉移股權的溫床，反而導致經濟不公平更為嚴重，並造就一批富有但腐化的政客與商人，以及政商結納的流弊（*Gomez and Jomo*，1997）。到 1980 年代以新自由主義為名的政策盛行，實質上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大行其道，被視為 1997 亞洲金融危機受創嚴重的主因（孫和聲，2010：6）。

危機與轉機相伴而生，長期執政勢力的內部分裂反而引發民間社會的空間開拓的可能性。亞洲金融風暴重擊馬國經濟，危機救援過程中，政商弊端表露無遺（*Rodan*，2004：121-36）。時任首相的馬哈迪堅持不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求援，反向採取寬鬆政策，並實施資金管制與固定匯率。原先被視為接班人、卻傾向採取不同財金措施的副首相安華（*Anwar bin Ibrahim*）遭馬哈迪革職。安華立即反撲，組織數萬人的群眾集會，到各地演說批評馬哈迪政權。最後安華遭逮捕下獄，引發民眾尤其是馬來裔公民的支持，激起強烈要求改革的社會運動。以馬來文音譯為「烈火莫熄」（「改革」的馬來文 *Reformasi*）的運動起始，展開一連串大變動（*Weiss*，2006：127-142）。社會上討論不同議題、採取各式各樣言論，反對內安法令運動組織行動，甚至街頭示威抗議行動一連串出現。

此外由於馬哈迪政府從 1995 年起為吸引國際投資，推動「多媒體超級走廊」建設，無心間讓網路的言論空間相對不受約束，網路用戶快速增加成長到六成人口（莊迪澎，2009）。1999 年底，重要的網際網路獨立媒體，紛紛異軍突起，相對於保守的傳統媒體，高度自主性的編採人員藉網路建立與受眾的互動，衝出樊籬，開始挑戰重要的公共議題，敢於直面國家機關和權力精英（莊迪澎，

2009)。馬哈迪下臺後，由阿都拉（Abdullah Badawi）接任首相。傳統廣電媒體也在其較為開放的政策下略出現自由化、管控鬆動的現象，主流媒體隨之越來越開放，刊登播送有時效性及批判性的內容，以競爭流失的讀者和受眾。

新世紀伊始，變動世局中，大馬國內浮現越來越堅實的民間力量。與其他先前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相類似的途徑，獨立自主的新聞媒體客觀公正地傳播訊息，公開提出對當權者的批評，並與各式各樣的社運組織、民間團體、公共知識分子結合，一起重振公民社會，成為政治體制轉型，從民主政治萌芽、建立到鞏固的堅強礎石（Diamond, 2008: 53）。事實上，回首體制轉型源頭，從烈火莫熄運動啟始，經歷數次淨選盟（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馬來文簡稱BERSIH）街頭大型集會活動。廿年來馬來西亞人民戮力爭取自由權利行使，各種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民間進步團體及日新月異的網路新興獨立媒體，加上公共知識分子以議題導向，要求課責，深化批判，培養跨社群的連結關係。以致公民社會快速進展，拓展有成，才終於導致以民意監督政府的力量越來越堅實，帶動朝野競爭更為公平，立下政權轉移的基礎（Gomez and Chang, 2014: 183-4）。

2008年3月8日的大選，長期執政的國陣遭遇安華領導的人民聯盟（簡稱民聯）的挑戰。由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和泛回教黨所組成的民聯在大選中首度突破國陣的長期政治壟斷，取得國會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席次，並且在13州裡面拿到5個州的執政權，政壇重整，民主行動黨取得馬國唯一華裔佔多數的檳城的政權，並超越馬華公會成為最大華基政黨，公正黨則成為國會最大在野黨，安華順理成章穩坐在野陣營領袖位置。國陣嘗到前所未有的敗仗，顯現疲態，阿都拉被迫於一年後下臺，由副首相兼財長的納吉（Najib Razak）接任。

自此，馬來西亞公共領域朝向民主化曙光初露，執政集團分裂競爭後，在越來越嚴厲的選票壓力下，展現良性循環的契機，但仍賴公民社會努力呼求。終於在經歷兩個政黨聯盟三度大選的強力競爭後，於2018年5月9日馬國第14屆國會大選投票後完成史上首度政黨輪替。這次選舉結果可說出乎觀察家的意外，長期執政的國陣落敗，數個反對黨組成的「希望聯盟」（馬來文：Pakatan Harapan）獲得分水嶺似的大勝，打敗因另一個主權財富基金「一個大馬」公司（1MDB）醜聞纏身的納吉領導的國陣政權（李晏臻，2019）。不過相當弔詭地，跟許多前此民主化的國家類似，統治菁英的分裂是帶來民主化而壓倒威權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獲勝的反對黨聯盟竟是由脫離巫統而另組新的土著團結黨的前首相馬哈迪出面領導，結盟對象是原先已成政敵的前副首相安華，兩人化敵為友，共同帶領幾個在野政黨，贏得政權。

然而從本刊2019年年初宣佈專號徵稿以後，馬來西亞的政局仍然不斷變化，多黨恩仇縱橫捭闔，老首相的新政府不過執政才22個月，就一再出現內部互鬥，最終發生馬哈迪面對安華這方要求信守承諾交班首相的爭執，馬哈迪作態辭職、討價還價卻失算，以致希盟成員大規模跳黨、聯盟重組等一連串事件（Tapsell，2020），總歸在被稱為「喜來登政變」的事件於2020年3月發生，聯邦政府的執政權重新回到以舊巫統各系統整合而成的「國民聯盟」（馬來文 Perikatan Nasional，簡稱國盟）手中。此後在COVID-19疫情逐漸侵蝕下，接手首相的慕尤丁（Muhyiddin Mohd Yassi）帶領的國盟政府治理能力備受考驗。政府以疫情為由，發布行動管制令，實施準封城，並且自2021年1月中之後就凍結國會運作半年之久（Moten，2020）。但疫情越來越嚴重，在最高元首與民意壓力下，國會才在7月下旬短暫重新召開，慕尤丁政府的幾

項缺失，再遭巫統黨官藉機批判，以撤回支持而逼宮，最終慕尤丁的國盟政府不過執政 17 個半月，又為巫統逼迫下臺。大選中失敗的巫統重新奪回主導執政的權力，2021 年 8 月 21 日，馬來西亞首相換由巫統副主席伊斯邁（Ismail Sabri Yaako）出任，新政府改以「大馬一家」為名，不再自稱國盟政府。

如前述，馬來西亞的政治局勢自從政黨聯盟輪替以來，變化甚快，當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之際，不同群體、世代、地域、政治勢力及社運團體間的關係也在動態發展中，並不容易掌握分析，還好本期專號第一篇論文，利亮時與彭婉菁就以〈馬國華人與民主演變：族群政治建構出的群體意識〉為題，用清晰的行文將馬國政治變動自獨立以來的來龍去脈帶出基本的輪廓，並特別指出 2018 年大選出線的民主政府又由於政治人物族群操控的手法導致政府重組，對民主化再度構成挑戰。申言之，馬來人至上的意識型態讓舊勢力的巫統藉由重組及結盟，重新逐步取回執政黨的主導位置，2018 年投下神聖選票亟欲改革的公民難免失望。而新的政黨結盟關係造成捍衛馬來人權益者與反對方的兩線對陣，更讓跨族群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依然是奢求。

對馬國的政治發展前景，不同世代的研究者也有處於相異觀察點的討論，在本刊之前已經有不少出版社或刊物比較迅速地就馬國民主政治的演變撰寫論文，甚或結集出版，惟多數研究聚焦於國會、政黨、政黨聯盟與聯邦執政權的得失，畢竟這些可能是傳統政治的核心議題，較為輕易可作為民主化進程的觀測指標。而本期專號另外刊出的三篇文章都從看似比較邊緣卻具影響力的視角觀察分析馬國的民主轉型，分別從公民運動、留臺女性知識份子參與，以及東馬砂拉越邦的角度提出研究見解並合理推測未來政局變遷路向，反倒有助於在詭譎多變的馬國政局中見到更堅實的民主化支柱。

利亮時與彭婉菁的第一篇論文如果希望凸顯的是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根深蒂固，那麼第二篇論文由馮垂華發表的〈空間、族群與社會運動：淨選盟大集會如何構建跨族公共領域〉卻藉由文獻探討及社運田野觀察，從城市空間及社會力的發展中探尋跨族群社會運動帶來民主化的更大可能性，及其對未來的長遠影響。馮垂華將吉隆坡具有明顯族群界線的空間，如馬來人傳統甘榜的「蘇丹蘇萊曼俱樂部」以及簡稱隆雪華堂的「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稱為「傳統類型公共領域」，這類空間長期在推動馬國的社會形構有起作用，不過較有族群的侷限性。相對地，跨世紀之交的不同族群在淨選盟集會中現身行動，使集會現場成為一個嶄新的跨族團結的公共領域。論文強調，淨選盟集會時採取多點集結的方式，許多吉隆坡市中心典型或傳統的族群空間被安排為集合點，「遊行」動員大規模穿著黃衫的各族群人民集體移動，強大能量衝破了城市空間原有的族群壁壘，相互交匯，也讓遊行隊伍內部與文宣內容呈現出多元族群的樣貌。遊行於是並非特定族群的抗爭遊行，而是屬於「馬來西亞人」的大集會。無論如何，論文結論還是從國家在治理及劃分族群空間上無可取代的角色，探討了空間對於公共行動的影響及限制。

第三篇論文〈馬來西亞民主轉型中華人女性知識份子的社會參與：兩位留臺人的個案研究〉由何蘊詩及陳琮淵合著，論文先以歷史文獻探討，宏觀地交代不同歷史階段華人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然後援引「交織性理論」，結合訪談資料及個案研究，分析比較呈現華人女性參與的特色與影響因素。論文以不同世代但同樣留臺返馬並致力公共參與、為廣義的參與民主制度努力的楊潔與傅向紅為例，探討女性經驗的多樣性及增能賦權的各種可能性。特別是兩人都有來臺深造的跨國移動經驗，激勵創發自由的思考及實作空

airiti

間。但世代不同，有不一樣的養成經驗。傅向紅在臺所受的學術訓練，使她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議題時更強調反思和分析，去挑戰權威。楊潔較晚來臺，浸入較成熟的臺灣公民社會，其社會參與更多以小規模體驗方式來傳達。身為留臺人，與臺灣學界及民間團體綿密互動，她們都發揮轉譯作用，將新知帶回，提昇民主參與程度，突破馬國華人社會對女性的束縛，成為跨國、跨文化理念的傳播者。

最後，本期專號唯一一篇研究紀要文章由俞劍鴻撰寫，*Grappling for Power in a New Malaysia: Politics of Sarawak Qua One of the Three Wilayah*，處理的是東馬的砂拉越的政局，梳理變化多端的政黨結構，推測近期可能的動向。熟悉馬來西亞的讀者都知道，馬來半島與東馬的砂拉越及砂巴素有不同的社會組成與政黨結構，東馬這兩個州屬比半島的行政區憲法地位也有所不同（石忠山，2018：47）。2018年政權輪替以來的第三任依斯邁政府改以「大馬一家」為名，指的就是國陣、國盟、砂拉越政黨聯盟（簡稱砂盟）與砂巴團結黨的多聯盟政府，其中擁有18席眾議院席次的砂盟，是為爭取更高自主權而退出國盟的幾個砂勞越政黨組成的，自2018年後成為砂勞越的執政聯盟，在最近幾度的聯邦政權轉換過程中，扮演一定程度左右政局的造王者角色。細讀本篇研究紀要，更能理解其屢次功敗垂成的背後原因。

馬來西亞的經驗再度告訴我們，民主化從來不是一蹴可幾的，也未必一往無回，線性式發展從威權到民主的過程只是天方夜譚。民主化總在歷史結構契機下勢力交會的錯綜複雜因素所啟動，威權體制的崩解與民主化的動力更常源自於經濟衰退、社會崩壞、執政集團分裂下，公共領域的勢力集結重組，並有賴於反對運動的抗爭策略加以促進。因此，首先，分析民主化過程不得不更為注重

現實的過程與機制，並將民主化與去民主化並列於可觀察的架構中（Tilly，2007：25-29）。第二、民主化固然在偶然狀況下發生，但一旦建立民主政治，在比較富有的國家就不太可能再走回頭路，就算經濟表現稍差也一樣；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將公平公正和人民的信任與賦權等體制在公共領域的表現看得和經濟同等重要（Chu et al.，2008：85）。日本、臺灣和南韓可作如是觀，馬來西亞當前似乎正見到類似途徑的展開；相反的，貧窮國家的民主政治十分脆弱，遭遇經濟危機時很容易崩解，重回威權體制，泰國、緬甸相繼軍事政變，和菲律賓、印尼地力勢力壟斷政治，都說明了經濟落後對政治轉型的掣肘不易突破，公共領域的根苗也容易因此斷送。第三、威權國家如果持續有效統治並且度過經濟高度成長期後，其威權體制常常十分鞏固，傳播媒體和民間團體受到統合，甚至內化成自我檢查，避免觸及敏感議題，就比較不容易出現轉型契機，新加坡即為顯例（Przeworski and Limongi，1997）。

總的來說，馬來西亞與許多具備中等國家能力的威權政體轉型走的路子類似，是由執政集團分裂互鬥而開啟，並在越來越嚴厲的選票壓力下，出現良性循環的契機。馬國從獨立以來，普遍式代議民主機構中的選舉、政黨與國會體制較少中斷，與拉美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此外在聯邦體制下，地方自主性提昇高度的契機也相繼展開。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傳統不絕如縷，全球化之後隨著國際往來及相互激盪而益發壯大。即使現在看來政治體制的轉型未竟全功，仍賴公民社會努力監督促進，朝向建立更合乎自由民主價值的制度，卻已是東協中最值得期待的國家。

中文書目

- 石忠山 (2018)。〈當代馬來西亞憲政體制的發展與挑戰〉，《臺灣國際研究季刊》，4：39-69。
- 李旻臻 (2019)。〈馬來西亞新宗族主義：1MDB 對黨財政和第 14 屆大選的影響〉，《黨產研究》，4：181-202。
- 孫和聲 (2010)。《尷尬的大馬經濟》，吉隆坡：燧人氏。
- 莊迪澎 (2009)。〈威權統治夾縫中的奇葩——馬來西亞獨立媒體運動方興未艾〉，《新聞學研究》，99：169-199。
- 黃進發 (2018)。《共業：我們能否擺脫被巫統統治的宿命》，馬來西亞：大將。

英文書目

- Chu, Yun-han, Michael Bratton, Marta Lagos, Sandeep Shastri & Mark Tessler (2008).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19, 2: 74-87.
- Diamond, Larry (2008).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Press.
- Gomez, Edmund Terence & Jomo K. S. (1997).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mez, James & Chang Han Leong (2014) *New Media and General*

- Elections: Online Citizen Journal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Kenyon etc. ed. *Democracy, Media and Law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 Space for Spee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80).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uzy, Diane K. (2006).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ingapore's and Malaysia's Resilient Hybrid Regimes. i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2, 2 : 47-68.
- Moten, Abdul Rashid (2020). The Politics of Manipulation: Malaysia 2018-2020, *Intellectual Discourse*, 28, 2 : 387-408.
- Przeworski, Adam & Fernando Limongi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2 : 155-183.
- Rodan, Garry (2004). *Transparency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Tapsell, Ross (2020). Malaysia in 2019: A Change of Government without Regime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pp. 191-208.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Press.
- Tilly, Charles (2007).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ss, Meredith L. (2006).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Civil Society and Coali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to Malaysia Democratization

Kun-Lu Wu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Ming Chuan University

On 9, May 2018, citizens in Malaysia completed the unexpected political transition, ended sixty-year reign of the Barisan Nasional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y have been striving for more freedom and political rights through social movements. A connected network cultivating cross-ethnic links among various civil society forces, with independent media, has led to the open arena of public opinion, the formation of a political tsunami, and the final completion of regime turnover.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status quo of internal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and parties, competed political forces are full of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that is why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remains low, and the Pakatan Harapan government lost power in 22 months.

This issue is a contribution of articles from unique perspectives to draw attention unto the causes and the scenarios of the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Keywords: Malaysia Democratization, Civil Society, Election, Regime Transformation